

## 矢野龙溪的亚洲主体性重申与区域秩序构想

周艳君<sup>(1)</sup>

**摘要：**本文以明治晚期日本“脱亚入欧”思潮及随之产生的文明身份悖论为历史背景，聚焦思想家矢野龙溪<sup>(2)</sup>对“西洋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面对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自我“非亚洲化”并转而成为亚洲内部“文明霸权”的困境，矢野龙溪通过其政论、游记与小说等一系列文本，率先对西方文明的尺度发起深刻质疑。

本研究系统梳理并阐释了矢野亚洲思想的核心要义：他强烈呼吁重申亚洲的“文明主体性”，反对将亚洲视为“西方的边缘”，并致力于挖掘亚洲自身的历史价值与道德理想，以重建独立的文明标准，提出了以“东洋大计”与“东亚联合”为核心的新型区域秩序构想。这一构想旨在批判并超越西方殖民逻辑与强权政治，试图在亚洲内部建立一个基于文明共生与平等协作的伦理秩序。

矢野龙溪的思想代表了日本近代思想史中一条被长期忽视的“另类”脉络。其价值不仅在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早期批判，更在于他为亚洲如何在世界结构中确立自身主体性、并构想非霸权的区域未来，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思考。在当代全球秩序深刻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发掘这一思想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理论意义。

**关键字：**矢野龙溪；亚洲主体性；区域秩序；东洋大计；明治思想；文明共生

### (1) 人种观的超克与同情心的文明论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际秩序基本由欧美列强主导，“文明国”这一话语本身，是权力结构的象征。是否为“文明国”，不仅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决定了其在条约、战争、外交中是否拥有对等的资格。在这样的语境中，亚洲国家通常被排除在“文明”的话语体系之外。1904年2月，日俄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争夺。俄罗斯持续向南扩张，日本则试图维护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双方矛盾最终激化为全面战争。战争爆发之初，国际社会普遍预期体量庞大的俄国将胜于日本。然而战争初期日本在海上与陆上的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对旅顺的封锁作战、对仁川的登陆、对海参崴舰队的牵制等，使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能力与国家组织能力刮目相看。

---

<sup>(1)</sup> 作者简介：周艳君，嘉兴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日本关西大学博士。本文获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矢野龙溪及其亚洲观研究”（23YJCZH335）资助，系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2)</sup> 矢野龙溪（1850-1931），本名矢野文雄，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报人兼小说家，代表作有《经国美谈》等，其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早期社会主义特征。

在此背景下，日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上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文明地位的争夺。当时国际政治依旧深受“文明与野蛮”二元论支配，国际法体系实际上是“文明国俱乐部”的排他性规则体系。日本作为“非西方国家”首次与西方列强之一的俄国进行全面战争，其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义，是否可以获得欧美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依赖的不仅是战争胜败，更在于其是否能够证明自己是“文明国”。日俄战争爆发2个月后，矢野龙溪发表了一段政论文字：

作为文明国之民，应当彼此一致。

说到底，我国人（日本人）与欧美人在人种上不同、宗教上也不同，这两件大事原本最难引发他们的同情。如果过去看到两人（两国）发生争斗，任何人都会出于人情常理站在同种族、同宗教一方给予援助。然而，唯独在这次的日俄战争中却并非如此。大多数欧美人反而对作为异族的亚洲人表示同情，反而对作为异教徒的日本人表示同情，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俄罗斯令人厌恶吗？虽然俄罗斯确实令人厌恶，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之所以给予日本人（同情与支持），是因为他们尽管是异种异教之人，实质上却在人道、学术、政体、人权等方面，与欧美的文明国家国民相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俄罗斯人，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

俄国虽为基督教国家，但实际上并无如日本这般的信教自由。俄国人虽为欧洲人，但其政体制度却是专制主义，并非其他自由国家所具备的那种体制。若从外形上看，俄国似与欧美为同伴，然从事实来看，反而有所远离。难道这不是其失去列国人民同情的原因所在吗？

(3)

这是矢野龙溪关于“文明国”与“亚洲主体性”深刻认知的重要体现。矢野并未从种族或宗教的角度为日本辩护，而是敏锐地指出：尽管日本与欧美在人种与宗教上不同，但在“人道、学术、政体、人权”等方面却已表现出与欧美文明国相同甚至超越的水准。这一判断颠覆了西方长期以来将文明等同于“白人”“基督教”的等级秩序，转而强调文明的本质应回归制度、自由与道德价值的实现。他借助欧美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舆论同情，指出西方社会的支持并非出于对“同种同教”俄国的天然亲近，而是基于对日本内在文明素质的认同。

这种“文明的实质观”构成了矢野文明论的核心，即文明并非西方固有的种族特权，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改革和实践而实现的普遍价值。他进一步通过对俄国的批判展开文明标准的反向论证：俄国虽是欧洲国家、基督教国，但无信教自由，实行专制制度，其本质远离文明；相对之下，日本虽为亚洲国家，却已实现近代制度与自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这种“文明亚洲 / 野蛮欧洲”的话语反转，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有力挑战，也是在近代亚洲政治语境中极为罕见的主体性主张。矢野并不主张脱离亚洲、依附西方，而是在文明的标准之中为亚洲国家争取正当的资格与地位。他通过再定义文明、再配置话语，既为日本争取国际支持，也为亚洲整体的文化自觉和制度建

---

<sup>(3)</sup> 矢野龙溪：《列国的同情》，《战时画报》第6号，1904年4月10日。收录于《矢野龙溪资料集》第四卷，大分县教育委员会，1997年，第485页。

设指出一条可行路径。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略意味，更在文明观念的历史演进中，预示了亚洲现代文明主体性崛起的思想可能。文章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表述：

同情者各不相同

(前略)

据报道，意大利人常常称赞日本富于美术，且两国气候温和相似，认为这是促发美术之国诞生的自然条件相同之故。在世界美术国家之列，日本亦属其中；而富于美术者，其武勇亦当如此，因而对日本抱有好感者当不在少数。

又如匈牙利人，或因其本属亚洲种族，与日本人种相同，故而有人将日本之胜利视为己胜，并引以为荣。

此外，中国人亦或因亚洲人能够压服欧洲强国而表示赞许；又印度及其他亚洲诸国人民亦基于上述理由，对我方表达同情之意。

然而，将日俄战争视作“欧亚两入种之战”的观点，乃我日本人所不愿采纳者。我国国民通常不以人种之异同为依据，而是将此役理解为专制压迫国家与自由文明国家之间之战争，并以此自况。尽管如此，其他亚洲各国之人，或仍有如上所述一般之看法，亦未可知。

即便为俄国之同盟国的法国人民，其内部持自由文明为基本理念之党派人物，亦有同情日本者，此为报纸所载之事实。若使日本的政体及人权状况与俄国无异，则此类人士本不可能对我方表示同情，此理自明，不待言说。<sup>(4)</sup>

在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背景下，亚洲各国对日本胜利的同情与支持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这不仅具有外交层面的现实意义，更在思想史与文明论的语境中，体现了亚洲文明主体意识的萌发。矢野龙溪在其评论中，通过对各国态度的分析，不仅描述国际舆论，也借此重新思考“文明”“主体”与“亚细亚”的定位，体现出其对亚洲文明地位的再估量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矢野指出，意大利人因日本“富于美术”且气候相似，将日本纳入“美术国家”行列，进而对其抱有好感。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共鸣虽未涉及制度层面，却暗示出对文化高度与国民素养之间关联的判断。匈牙利人因“本属亚细亚种族”，将日本胜利视为己胜；中国、印度等亚洲诸国亦因“亚洲人压服欧洲强国”而表达支持。此类认同虽仍停留在人种或地域层面，但也体现了亚洲人民借助日本胜利进行自我肯定的倾向，是亚洲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的表现。日本的胜利被投射为整个亚洲的胜利，这种象征意义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更成为文化与精神领域中的鼓舞与认同。

然而，日本人自身并不愿将此役视为“欧亚人种之战”。矢野明确指出，国人更倾向于将战争理解为“专制压抑国家与自由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从而自我定位于“文明国家”一方。这种以制度和理念为标准的文明观，在当时日本知识界广为流行，尽管如此，矢野亦未完全否定亚洲视角，而指出“其他亚洲人或仍有上述看法”。这显示出他对亚洲其他国家仍将日本视作区域代表的

---

<sup>(4)</sup> 矢野龙溪：《列国的同情》，《战时画报》第6号，1904年4月10日。收录于《矢野龙溪资料集》第四卷，大分县教育委员会，1997年，第487页。

现实有清醒认识。日本在迈向“文明国”的同时，也无法摆脱作为“亚洲象征”的双重角色。这一矛盾正反映出亚洲主体意识在文明话语中逐步展开的复杂性。

进一步地，矢野特别提及法国内部持“自由文明”为理念者，即便身为俄国盟友，亦对日本表示同情。他强调，这种支持并非基于地缘或文化情感，而是因为日本政体与人权制度的相对进步。若日本制度与俄国无异，则不可能赢得此类同情。这一判断体现了矢野对“文明”概念的现代理解，即文明的认定基础应为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而非传统的族群、语言或地理因素。这一认识也为亚洲争取主体性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通过制度与理念的更新，亚洲国家有可能突破西方中心主义下的“非文明”定位，重建自我认同。

矢野通过这段论述，在思想层面建构起一个多层次的文明视角。他既呈现亚洲诸国对日本胜利的情感性认同，也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者因制度理念而表达的理性同情。他在这二者之间构建起一个思想中介地带，使“亚洲”既非封闭的文化共同体，也非被动的“他者”，而是处于不断生成中的文明主体。这种主体并非固定于人种或地理，而是在历史事件与思想实践中逐步形成。矢野龙溪通过对战争同情者立场的剖析，不仅回应了当时的国际舆论，更揭示出亚洲文明主体意识的内在张力。他既呈现了亚洲国家对日本胜利的象征性认同，也超越了人种主义的局限，强调制度与理念的现代价值，强调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应当超越人种主义的框架，进入普遍主义的文明话语结构中。这种思想努力体现出其在西方主导的文明话语体系中，为亚洲争取主体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通过这种批判性反思与结构重构，矢野的文明观体现出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亚洲意识”，这不仅是对现实局势的回应，更是近代东亚思想史中的重要标志。

## （2）黄祸论批判中的亚洲主体意识觉醒

“黄祸论”（Yellow Peril）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广泛流传的一种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思潮。其基本论点是：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因其人口众多、文化异质、生活刻苦、服从性强，极有可能在未来威胁白人主导的文明秩序和世界权力结构。这一概念虽然并无严密的理论体系，却因其与帝国主义、种族等级论、文明论等紧密结合而具有极大的传播力和政治动员力，成为西方世界面对东方崛起时广泛使用的一种防御性话语。

黄祸论的提出与传播并非一时之作，而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诸多历史事件与思想背景的推动下逐渐成形并强化的。最初，随着中国劳工大量流入北美、澳洲等地，西方社会对“华工威胁”产生恐慌。尤其在美国和加拿大，排华法案和排斥性移民政策的出台，便是对华工“威胁论”的直接回应。此时黄祸论的核心仍聚焦于经济层面的劳动力竞争和文化差异的不安。然而，到了19世纪末，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国家现代化，政治体制、军事力量和工业生产均有长足进展。特别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打破了西方对亚洲“不开化”的既定印象，首次以非西方国家之姿击败欧洲列强支持的中国，这一历史转折极大动摇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自信。黄祸论由此开始转向针对日本的焦虑。在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即通过绘画和政治言论

正式提出“黄祸”的说法,将亚洲人描绘为神秘而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呼吁欧洲文明必须联合防御。这幅著名的宣传画中,一名金色战袍的佛教战士从东方升起,威胁着欧洲女神形象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秩序。由此,“黄祸”不再仅是对亚洲劳工的恐慌,而是上升为一种全方位的文明冲突想象。

20世纪初,黄祸论因日俄战争(1904-1905)的爆发而进一步扩散。日本以一支现代化、纪律严明的军队击败了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强国俄国,这一事件不仅对亚洲各国造成巨大激励,也使得西方社会更加意识到东方力量的实际威胁。在西方主流媒体与政界人士的言论中,日本不再是受教化的“学生”,而是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者、甚至是“异文明”的代表者。在这种背景下,黄祸论演变为一种防御性极强的意识形态,不仅用来解释西方在亚洲的殖民行为合理性,也成为国内排外、限制移民的重要理论支撑。

黄祸论的传播还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益兴盛的“文明等级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相关。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世界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的种族与文明,白人居于顶端,亚洲人则被置于中下层,既不被认为是野蛮人,却又不具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与理性。这种“中间他者”的定位,使得亚洲人在西方社会中既被需要又被恐惧,既是模仿者也是潜在的颠覆者。而日本的快速崛起,更是加剧了这种认知的矛盾性。

在此背景下,日本知识界逐渐认识到,所谓的黄祸论不仅是西方对亚洲的刻板偏见,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其掌控文明话语权的意图。在这一思考潮流中,矢野龍溪针对这种文明与种族交织的复杂局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驳黄祸论》

近年来在欧美,时有鼓吹“黄祸论”之人。然而日本国民对此说之含义几乎难以理解。从历史上来看,亚洲的大国乃中国也,然中国本部之人民性情和平温顺,从未侵略他国,且此等行为与其民族性格亦极不相符。彼等即便在战争中,也多长于守而拙于攻。倘若欲驱使此种人民从事侵略活动,实属绝无可能。凡是对中国情况稍有了解的外国人士,当对此深有所知。

再者,日本为岛国,地形所限,自古无远征他国之习。其国民所追求者,亦不过是国家的生存与安定而已。故若有人谓中国与日本合力侵略亚洲以外的国家,恐怕中日两国人民皆会对此一笑置之。

日本为立宪国家,舆论间接左右国政之动向。即使国内存有主张发动不急之侵略的人士,亦非如专制国家般可以恣意行之。既然日本如此,中国人民又是本性向和平、厌恶战争之民,若谓由此二国发动对欧美之“黄祸”,则理性之人断难认同此类说法。

诚然,在亚洲人民之中,亦非无以侵略为业者。譬如亚洲北方边陲之未开化、尚野蛮者,其行为除杀戮之外,几无他长。成吉思汗、铁木真、忽必烈汗、阿提拉(アッチラ)等人皆属此类民族之领袖。他们率众侵略印度或欧洲者,皆此等北亚民族也。此种民族远离文明,惯以掠夺为生,入侵他国、逞其武力已成为其习俗。自古中国历代屡遭其扰,正是这些北部民族所为。倘若所谓“黄祸”真会对白人构成威胁,其源头亦只可能为此类民族。如今统率此

等民族者，非俄国皇帝莫属。倘若其持侵略他国之主张，驱使此类民族，恣意妄为，则欧亚两洲之文明国家，势必如历史所载，蒙受巨大之灾害。故当人们提及“黄祸论”时，日本人应当明确认识到，真正孕育此灾祸之源者，乃俄国也。

倘若俄国人竟也高唱“黄祸论”，则尤为可笑。黄祸之根非在日本与中国，而今正是在俄国自身。今日欧亚诸国所应真正恐惧之黄祸，并非日本与中国，反而正是俄国。

若再有欧洲人将亚洲人视为劣等民族，并将亚洲人为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与独立所作之努力视作“黄祸”，则此种看法亦属严重谬误。普天下任何民族，皆有维护自我生存之权利。倘若此种权利之行使竟被视为不可，则所谓“黄祸”一词，原本便是毫无意义之虚妄之辞。

随着欧美之间的交通与贸易日益频繁，接触日趋紧密，日本国民近年愈发趋于“世界公民主义”（即种族无差别主义）。这是理所当然之发展，也符合时代之趋势。日本人与欧美人之间，并无特别亲疏之别。凡是道德法治大致相通者，日本人多以兄弟视之。凡如日本一般享有自由权利、实行立宪政治、乐于和平事业之国民，皆被日本人亲切视为同胞朋友。种族之异同，日本人实不甚介意。此乃欧洲人最应明了之事实。<sup>(5)</sup>

矢野龙溪在1904年所发表的《驳黄祸论》一文，是其在日俄战争前后，对当时欧美盛传的“黄祸论”作出的深刻回应。这篇文章不仅在逻辑上驳斥了西方对中日两国“威胁论”的认知偏见，更在思想上重申了亚洲人的主体地位与文明尊严，体现出他一贯秉持的文明普遍主义、人种平等理念以及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自觉。在这一论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矢野不仅关注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更试图从话语权的结构中找出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压抑机制，进而赋予亚洲人自我认知与表达的道德正当性。这正是“亚洲主体性重申”的思想核心。

文章开篇即指出，虽然欧美各国间或鼓吹“黄祸”之说，但日本国民多难以理解此一论点之逻辑何在。矢野首先从历史与民族性格入手，指出中国自古为亚洲大国，其民众性情温和、崇尚和平，从未主动侵略他国，其人种性格也极不适合军事扩张。即便是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多擅守拙攻。在此基础上，矢野提出，若有人试图鼓动中国人民从事侵略之举，实为不合事理、不可能之事。这种以温和理性剖析中国国民性的方式，不仅是在为中国辩护，更是矢野以亚洲内部之理解对抗西方外部污名化叙述的体现。他要求从中国人的“自我”出发来理解其国家行为，而非从西方所构建的“他者”想象中套用偏见标签。这种姿态本身即是亚洲主体意识的体现。

紧接着，矢野转向对日本的阐释。他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自古无远征他国之传统，其国民一贯重视自我生存与国体的维持，而非扩张侵略。即使在近代取得某些军事胜利，其政治体制为立宪政体，亦非如专制国家一般可轻易发动不必要的战争。这种制度上的制衡与民意的介入，使得“侵略”非日本国家行为的自然属性。矢野在此强调的是，日本并非西方所臆想的“军事化东方”，而是一个有着文明、法治与责任的现代国家。在回应“黄祸论”时，他并未简单地否定“威胁”的

---

<sup>(5)</sup> 矢野龙溪：《驳黄祸论》，《战时画报》第8号，1904年8月10日。收录于《矢野龙溪资料集》第四卷，大分县教育委员会，1997年，第499页。

存在,而是以制度理性与国民性格作为支撑,重构对日本现代性的理解,力图挣脱西方话语中“落后东方”的文明想象。他强调日本的现代化并非为了威胁他者,而是为了在文明世界中争取平等的发言权与尊严。

文章最为重要之处在于,矢野通过历史回顾,将真正的“黄祸”指向非文明的暴力传统。他指出,历史上确有来自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印度和欧洲的入侵,如成吉思汗、铁木真、忽必烈以及阿提拉等,这些民族并非中国或日本之属,而是“未开化、以掠夺为业”的北亚民族。矢野藉此明确划分了“文明亚洲”与“野蛮亚洲”的界限,将中国和日本归入文明有序之列,而将真正的侵略性归因于非制度化的掠夺文化。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这些北方民族在当代的延续者正是沙皇俄国,其本质上延续了“北狄掠夺传统”,对外扩张,破坏和平。由此,矢野在立场上巧妙地将“黄祸”一词回赠西方,认为今日若真有“黄祸”,其祸源并非中国与日本,而恰是俄国的扩张主义与专制体制。这不仅是一种战略上的反击,更是话语层面对“亚洲威胁论”的重新定义。矢野由此提出:亚洲的文明国家应被理解为和平与进步的力量,而非西方所构建的“潜在威胁者”。

此文的另一高明之处在于对人种主义与文明等级论的根本否定。矢野直言,即便欧洲人认为亚洲人为“劣等人种”,若他们为保护自身的独立与正当权利而斗争,就被视为“黄祸”,则这是极其荒谬的逻辑。他进一步指出:“地球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维护自身生存的正当权利”,若此等权利也被视为“威胁”,则所谓“黄祸”一词便全无意义。此处的论述已超越地缘政治范畴,进入对普世正义与人权理念的哲学层次讨论。他以极其清晰的语言表达出对亚洲人民应享有与西方人民同等权利坚持,展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与文明自信。

矢野最终指出,随着东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日本民众正在逐步接受“世界公民主义”——即种族无差别主义。他强调,日本人与欧美人之间并无天然亲疏之别,只要共享道德与法治的原则,便可相互认同、视为兄弟。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他超越国族局限的普遍主义文明观,更是他试图在黄祸论逻辑之上建构亚洲与世界对等共生关系的努力。他并不拒绝现代性,也不排斥西方文明,而是努力将亚洲的现代性经验纳入世界文明之体系中,以期构建一种超越种族等级的全球对话秩序。

矢野龙溪在这篇《驳黄祸论》一文中,透过对黄祸论的系统反驳,实则进行了对亚洲文明主体性的重申。他并未简单地诉诸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历史分析、制度逻辑与文明比较,明确主张亚洲国家具备独立的判断力、文明的持续性与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正当资格。在日俄战争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的这篇文章既是对西方偏见的回应,也是对亚洲共同命运的深刻思考,具有跨越时代的重要价值。矢野龙溪的亚洲观之所以可贵,正在于他既不自卑于西方,也不盲目拔高亚洲,而是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为亚洲争取应有的文明位置与尊严发声。

### (3) 东洋大计与东亚联合的秩序构想

19世纪80年代初,国际关系格局正处于帝国主义扩张加速的阶段,欧美列强间的势力角逐日益白热化,并迅速向亚洲扩展。在东亚地区,清朝统治日渐衰微,朝鲜半岛成为区域秩序中的战略焦点。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朝鲜发生激烈的内乱,导致清朝与日本相继派兵介入,标志着东亚列

强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已经从外交博弈转为军事与条约上的直接干预。这一时期，日本首次通过与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半岛确立了初步影响力，同时也引发了与清朝之间围绕朝鲜事务的权力摩擦。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英俄两国的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其影响渗透至中亚、蒙古和中国西部边疆。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清朝沿海地区的经济渗透不断加深，通商口岸体制趋于稳固，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遭遇全面冲击，亚洲区域自主性的根基不断被削弱。

正是在这种列强环伺、区域秩序动荡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兴起了关于“东洋问题”的广泛讨论。知识分子与政论家纷纷思索日本在亚洲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在面对西方列强压迫的同时，联合邻近国家共谋自强。在这一思潮中，矢野龙溪敏锐地意识到亚洲国家共同命运所处的历史关口，并积极提出“东洋大计”与“东亚联合”的构想，试图以亚洲为主体重构区域秩序。这一设想不仅是对当时东亚危局的深刻回应，更体现了日本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家对亚洲主体性与文明协调的自觉探索。

矢野在19世纪80年代初的代表性政论《论东洋的大势与大计》（原题《東洋の大勢大計を論ず》，1882年9月5-6日）中，便集中表达了他对东洋局势的深刻判断及日本在其中应承担的战略角色。文章强调中日两国虽国力有别，但就东亚总体局势而言，二者在影响力上处于均衡状态，任何一方若与对方交战，最终都将两败俱伤，使俄国等列强坐收渔利。因此，中日“相互争斗、相互消耗”绝非良策，唯有“相互结盟、相互扶助”，方为东洋全局之大计。节选原文如下：

#### 《论东洋的大势与大计》

（节略）

在整个东洋地区，能够被称为重要国家者，仅有中国与我国而已。虽二国在领土广狭、国力大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若从当前的国势与威力的平均状态来看，能与中国并立者唯我国而已。即便中日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中国的势力亦绝不能压倒日本；而日本之英勇气，亦远远超越中国，足以在短时间内予以压服，然而其力量亦不足以将中国完全消灭。

是故，现今中日两国间的力量处于某种均衡状态，可谓“未分强弱优劣之局”。若两国互争，即便结果上自有胜败归属，但最终将导致双方国力的损耗，并反为他国图利，此种后果，无须智者亦能明察。

若更进一步设想：若中日发生冲突，而俄国乘机介入，支持一方，则两国之盛衰兴亡，便完全操于俄国之手。犹如百斤重物，在均衡之际，若稍加一朱（微量）即可改变轻重。更何况俄国一旦乘东洋之虚而入，其所图决非区区小利，而是关乎我国安危存亡之大事。

换言之，今日东洋诸国之和平稳定，实属幸事，并非其自身有力维系，而是暂时无事所致。若东洋无事，则俄国无隙可乘；若能令俄国无从插手，则中日两国即能避免相争相耗，转而养精蓄锐。是故，中国今日之忧患，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俄国；日本今日之忧患，亦非中国，而是俄国。使俄国有可乘之机，绝非东洋之良策。

因此，中日两国之“大计”，应在于“相互结盟，相互扶助”，而非“相互争斗，相互消耗”。东洋之“大势”已然如此，东洋之“大计”亦不得不据此而定。

(节略)

若中国政府向朝鲜派遣军舰与兵力，如其所言，仅为“忠告与警备”之目的；即便日朝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而中国选择不加干涉，袖手旁观，最终亦无法阻止俄国插手，如前所述，结局可见一斑。况且，即使中国初衷为旁观，其终究能否始终保持中立，仍属未知。

当我驻朝公使初与朝鲜朝廷开展谈判时，局势尚处于和平可控之中。此时中国政府若确有意忠告朝鲜，劝其和平谢罪，则或许其本意出自稳定东亚之战略全局。如李鸿章此类人物，当能洞察“东洋大计”，不致轻易唆使朝鲜顽拒日本要求，以激化冲突，招致中日兵戎之祸。

观察中国观察使马某对我公使与领事态度之温和，或可视为其真实用心而非虚伪矫饰。然而，此种态度或仅为初期策略。假使中国政府之意实为调停，然朝鲜方面若顽固执迷，最终不幸引发战争，则届时中国是否依然旁观，抑或援助朝鲜，即成一大疑问，难以判断。

但从中国此前积极介绍西方国家缔结条约、建立邦交等事实来看，中日之间一旦交战，中国终将无法保持袖手状态。如此一来，便可能导致中日裂隙扩大，两大国相互耗损，最终仍归利于俄国。

由此可见，今日日朝间之纷争，绝非单纯的双边事务，而将波及整个东洋之大势，并影响其“大计”。然则，日朝之争端虽属初阶，然若处置得宜，未必致使“东洋大计”受损。

若有识之士能深谋远虑，体察东洋之大利在于中日亲好，进而据此确立国策，始终坚守和平主义，容忍局部摩擦与小怨，并以宽容与克制之态度应对朝鲜，方可实现国家长久福祉。届时，人人心中自能无愧而快然。<sup>(6)</sup>

文中，矢野龙溪明确提出了以“东洋”，即东亚为核心的联合构想，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中日之间因冲突而陷入国力消耗，并引发外部势力的干预，从而实现东亚区域内部秩序的自我稳定与主体性的确立。文章通过对中日两国国力状况的冷静分析指出，尽管两国在领土与资源等方面存在差距，但在当时的实际国力上已基本趋于均衡。若发生战争，尽管一方或可暂时占优，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实力的严重消耗，使得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从中渔利。

矢野强调，任何形式的中日对抗，最终都将导致两败俱伤，而真正受益的将是虎视眈眈的俄国。他断言，这样的结果即使不假他人之智也已十分明显。因此，他提出，中日两国的根本对策应当是互相结盟、互相援助，而不是相互敌视与对抗。这一主张不仅是对双边关系的现实建议，更是一种具有区域主义视野的秩序构想，试图在东亚内部建立起相对平衡与合作的结构，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渗透。更具战略意义的是，矢野将当时的日朝纠纷提升至“东洋大计”的视野，指出其影响远超日朝双边范围，实质上关系到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走向。他明确提出，日朝之间的纷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关涉东亚整体稳定与联合的试金石。若应对得当，便可巩固区域和平；若处理失当，则极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对立与破坏，从而破坏整个东洋的战略格局。

---

<sup>(6)</sup> 矢野龙溪：《论东洋的大势与大计》，《邮便报知新闻》，1904年4月10日。收录于《矢野龙溪资料集》第五卷，大分县教育委员会，1997年，第304-306页。

在这一逻辑之下，矢野特别指出，即便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初衷和平，若朝鲜方面顽固不化、最终导致中日之间爆发武力冲突，中国亦难以真正保持中立，必将被卷入战争，最终结果仍是中日双方共同受损，而俄国则有可能借机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力。这种清晰的战略判断，使矢野的东亚联合构想具有高度现实感，也展现出其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眼光。在文章末尾，矢野进一步呼吁中日两国的知识阶层与政治精英应当深刻体认到东亚共同体的命运连带性。他主张，应以和平主义为国是基调，克制民族间的情绪性冲突，容忍一时的外交矛盾与局部摩擦，以换取区域的长远稳定与国家的持久福祉。他强调，只有真正理解中日亲善合作所带来的东亚整体利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策方向，并由此建立起持久和平的国际关系结构。

从《论东洋的大势与大计》一文可见，矢野对“东洋”的理解并不限于单纯的地理空间范畴，而是融汇了文化认同、文明共生与政治命运共同体等多重意涵。他所构想的“东洋大计”，是一种以东亚诸国为平等主体，在外来压力下联合自强的区域秩序构想。该秩序一方面强调各国主权的独立与自主，另一方面亦重视文明间的对话与协作，体现出对当时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替代性探索。五年之后，矢野又于1887年为藤野房次郎所著《东洋之安危》撰写序言，其选文如下：

#### 《东洋之安危》

(略)

上述所论，正是我们主张与英国结盟，并将中国纳入其中，以维持东洋权力均衡的基本立场。然而，外交政策本属权变之术，应随时机而调整。倘若英国援助中国，转而更加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那么，作为权宜之计，也不排除与俄国结盟以进行抗衡的可能性；亦或者，日清两国联手以对抗英国，抑或是日英结盟以遏制中国，皆有可能。此类举措，均属外交权术中微妙的策略，应视具体时机而定，无可预设。

然而，倘若一切皆可为之，我们所期望者，首在于日清英三方结成联盟，共同维持当前东洋的和平局势。藤野氏的主张，主要强调日清联合的利益，并大致论及日清英三国同盟的好处。他又似乎主张，只要东洋之中两国携手，便有可能抵御西方列强之压力；亦或认为，日本不必与十二个西方强国结盟，而可与中国一道维护自身地位。以上种种论点，与我们一贯所持的见解略有差异。

尽管如此，对于他所提出的“日清联合”之利益，我们仍然认为与我们自身主张颇为接近，并且，这的确也是当下东洋局势所亟需讨论的一种重要议题。<sup>(7)</sup>

矢野龙溪于《东洋之安危》所作序文，体现了其一贯主张的“东洋大计”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对东亚联合的秩序构想提出了战略性回应。矢野所称“东洋”，并非仅为地理概念，而是涵括文化、文明及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区域联合体。在此文中，他肯定藤野房次郎所提出的“日清连衡”主张，认为在帝国主义扩张与列强对华干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东亚诸国的联合已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

---

<sup>(7)</sup> 矢野龙溪：《东洋之安危》序文（藤野房次郎著，集成社，1887年）序文，1887年12月。收录于《矢野龙溪资料集》第七卷，大分县教育委员会，1998年，第496-498页。

独立的必要手段。虽然矢野对藤野将“日清联合”视为对抗西洋的唯一方式表示保留，但他强调，无论策略为何，“联合自强”应为大势所趋。

更重要的是，矢野展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外交视角。他指出，外交政策应因时制宜，不排除在特定情势下与英、俄等列强结盟，但他最终仍倾向构建以日本为主导、日清英三国合作的区域秩序。这种秩序既非完全依附于西方，也非简单的对抗体制，而是一种基于东亚文明认同与战略利益协调的“替代性秩序”。从“东洋大计”出发，矢野提出的东亚联合构想，正是面对西方主导世界体系时，一种具有文化主体性与政治实践性的区域主义探索。

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作为亚洲国家首次战胜西方列强，不仅极大振奋了国民士气，也促使社会各界对国家定位与未来走向展开深入反思。战后缔结的《朴茨茅斯条约》使日本获得南满铁路经营权及旅顺、大连等租借地，从而在东亚确立了新的主导地位。然而，这一胜利也加剧了西方列强对“黄祸”的警惕，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潜在的种族与文明冲突。在国内，胜利既稳固了明治政府的统治基础，又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帝国主义扩张”与“亚洲领导责任”之间的价值分歧。一方面，部分知识界人士鼓吹国威发扬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也有观点主张应对亚洲邻国承担道义责任，实现区域共存共荣。与此同时，朝鲜、中国等邻近国家陷于内忧外患，区域秩序濒于崩解，东亚世界面临重新构造的紧要关头。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矢野龙溪撰写了《日本在世界中的未来》一文，再度提出“日英仍然寄望于清国”的论断，不仅回顾了东亚多边合作的初衷，更从历史与现实双重视角出发，重新呼吁构建以日本为轴心的“东洋大计”。不同于鼓吹霸权主义的同代言论，矢野强调日本在应对文明冲突与构建东亚秩序中应扮演的“文明中介”角色，其思想反映出明治知识人面对帝国转型时的理想主义追求与历史责任感。相关内容如下：

#### 第十五章 日英仍然寄望于清国

余（我）在二十余年前，曾经主张由日本、英国、清国三国结盟，以维持东洋的和平。然而其后，清国的国力未能与人竞逐，也未能接受我方的善意，最终导致了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战争（即甲午战争）。不仅使得“由日本与清国两国之力共同维护朝鲜安定”的希望破灭，不幸的是清国在此次战争中战败，其国力之薄弱，远超列国所料，也因此昭然于天下。

然而，我之根本宿论——“日英提携（结盟）乃维持东洋所必需”——有幸地一步步得以实现，且随着岁月推移，结盟的成效愈加显著，最终，仅凭两国之同盟，亦足以成为东洋和平的守护者，进展至此。

尽管如此，我仍是期望清国之安定者。<sup>(8)</sup>

文章开篇，矢野回溯了其二十余年前的设想：由日本、英国、清国三国结成政治与文明上的合作体，以维持东洋和平与秩序。这一构想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末期列强纷纷染指东亚，而清朝虽

---

<sup>(8)</sup> 矢野龙溪：《日本在世界中的未来》，近事画报社，1905年。收录于《矢野龙溪资料集》第四卷，大分县教育委员会，1997年，第442-443页。

地大物博，却积弱不振，常受列强宰割。矢野曾寄望于清国能够与日本携手共同稳固朝鲜半岛，从而对抗西方的扩张势力。然而，甲午战争的爆发粉碎了这一希望，清国的溃败昭示其国家体制与军事实力的深刻危机，也迫使日本走上独自承担东亚事务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矢野肯定了日英同盟的现实意义，认为其“已足以成为东洋和平的守护者”，但他并未因此否定清国的地位与可能性。相反，他强调，“我仍是期望清国之安定者”。

因此，“东洋大计”在矢野笔下，既不是单纯的政治结盟，也不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借口，而是一种建立在“亚洲文明自觉”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秩序理想。他所设想的“东洋联合”，不是文化上的同质化，也不是政治上的统治与服从，而是相互协作、彼此激励的动态过程。在这一构想中，日本应以其现代化成果引导东亚，但不应将自身凌驾于他国之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西方式殖民话语的陷阱，走出一条属于东亚自身的文明更新之路。

综上所述，矢野龙溪的东亚构想，以其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勾勒出一幅迥异于弱肉强食法则的区域秩序蓝图。这一构想的核心，正是对亚洲主体性的自觉重申——他试图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浪潮中，为东亚寻找一条既非依附亦非对抗的独立发展路径。虽然在当时殖民扩张与军事竞速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浪潮下，他的设想未必具有现实操作性，但它却意味着日本知识分子在思想层面对西方中心秩序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企图。

与当时主流对“强国崛起”与“东洋霸权”的狂热歌颂不同，矢野的“东洋大计”展现出难能可贵的理性克制与伦理自省。这种思想特质，源于他对西方殖民主义破坏性的清醒认识，以及对中日文化同源性的执着信念。他所构想的区域秩序，不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再殖民化，而是以文明共生为目标的“和而不同”结构；不是对他者的单向征服，而是建立在平等与互敬基础上的战略共谋。这一构想，既是对亚洲文化主体性的积极确认，也是对帝国主义逻辑的自觉扬弃。

这一被长期遮蔽的思想资源，在今日重新审视时愈发显现其现实意义。它不仅为我们理解东亚近代史提供了被主流叙事忽视的多元路径，更在当代全球秩序重构的背景下，提示我们区域秩序的重建必须植根于文明主体性的觉醒与伦理性的制度设计。矢野龙溪的探索表明，真正的区域合作，不应是霸权体系的复制，而应是文明互鉴、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构建。他的思想遗产，因而超越时代，成为我们今天思考东亚未来与全球治理时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